

陈江风 著

觀念

与 中国文化传统

阴阳五行臆说 神权的十月历 “河图”、“洛书”探源

天人关系流变 八卦与天体宇宙模式

风水流派与传统环境理论 故宫的建筑观念

宇宙观与思维方式 天道与哲学

知天与神机妙算 文学与天道

道家长生术 房中养生术

天文观念与祭祀风俗 天国世界与丧葬风俗

觀念◎中國文化傳統

陳江風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陈江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

ISBN 7-5633-6203-7

I. 观… II. 陈…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48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8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60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个形象的启示

绪 论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李白《将进酒》中的一句诗。这句诗形象地说明了黄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

“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说黄河之水从天上而来，也就是说黄河之水的源头在天上。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个形象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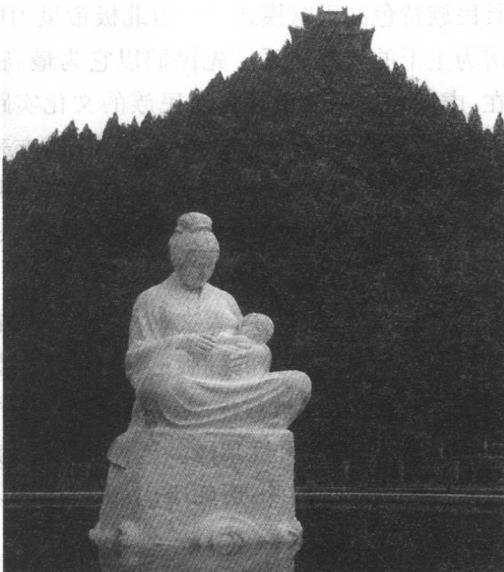
在一马平川的中原腹地，在黄河之滨的邙山游览区，矗立着一位哺乳不辍的伟大母亲，慈祥、和蔼、朴实、善良。她深情端详着怀中的幼子，栉风沐雨而母爱长存。她就是以“哺育”命名的黄河之母。

九曲黄河奔腾咆哮。

其主流、支流纵横交错，构成水网，流贯于北中国大地，拓展着华北平原。于是，黄土地上的黄河子孙，有条件开田垦地，较早地选取农耕文明形式，有条件在黄河母亲的怀抱里，吮吸乳汁，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

瞻仰黄河之母的仪态，脚踏崎岖盘桓的黄土地，吟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这“天上来”



三个字,是否给人以某种文化的启示呢?诚然,把黄河之源上溯于天,本出于一代文豪李白的天才创造。从文学角度看,这万古传诵的杰作,是对母亲河的讴歌,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诗人于无意识中点出黄河与天的关系,恰恰暗示了黄河文明的某种特点。

的确,无论从主观(人)还是从客观(自然)条件的角度看,作为以农耕为突出特点的黄河文明,从它的原始形态开始,便与天结有不解之缘。农业生产必须不违农时,对时令推移规律须准确把握;而对巍巍苍穹神秘力量的体悟与崇拜,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原始宗教观念和稳定的文化原型,它源于华夏民族独到的体悟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联想能力等主观条件,同时又带有浓重的农业文明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文明之活水,确然是从湛蓝的“天上”流贯而来。

历史上,中国人把“镶嵌”在这湛蓝天幕上的天体,组合成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天穹模式——以北极帝星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天象体系。先民们以它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家园所在,虔诚地用它来指导自己民族的文化实践。于是,它成为中国文化古今流贯的原型之一——中央居要,四方来效——东西南北中,中土为贵、中央为尊、中庸平正、地胆天心……由此产生了政治原则、国家体制、民风民俗、文化现象,形成了由来自天,天经地义,独具风格的文化特色。

二十年前,我曾在《天文与人文》一书中论述到,中国的封建国家政体是这个原型模式的翻版:天上的北极星,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相当于帝王;各地被封侯、被任命的官吏,相当于拱极的二十八宿;满天的小星,相当于百姓黎民。这种与天同构的国家政体被视为完美无缺的理想结构。因此,历朝历代,中国人都以“天朝上国”自诩,风行千年而不衰。

因此,历代都自觉地把人事政治、国家体制与天象模式相比附:“天道恒象,人事或遵(遵从)。北极足以比圣(圣明的君王),众星足

以喻臣(臣下)。紫宸(北极所在的紫微宫)岂惟大邦是控(哪里是只控制大藩邦),临朝御众而已。实将先天稽极,后极立经,然后为政同乎北极,来方类乎众星。”

这段文字节选自《文苑英华》卷八的《众星环北极赋》。它不仅指出封建国家法天设制的现实,指出为政如同北极,居其所使众星拱卫,而且表现出一种中央大国得天独厚的优越感:邻邦友国统统为“来方”,即受中央德化感召而纷纷依附的“招徕之邦”,其地位只能是等同臣下——“类乎众星”。

从这一观念出发,中国的官制遵此原型模式为蓝本,建立自己的管理体制。古人认为,中国天象体系中,拥有几乎完全可以和历代官制相对应的天官体系。中国的天界是一个等级有序、秩序井然的王朝,由“帝星”临祚,勅封四方,皆曰“天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①所以,天界中三公、四辅、太子、诸侯、骑官、郎官、司命、司空、司徒等,大小官吏一应俱全,君君臣臣,尊卑有序,各司其职,形成一种理想化的政治结构。

正因为如此,历代奉行“官制象天”的法则以建立人间天朝。据《周礼》,先秦时期依照天的格局制定官制已成传统。到王莽改制,刘秀定鼎,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王莽其人笃信谶纬迷信,日夜幻想升天,曾令臣下造天车,饰羽葆,击建鼓,树扶桑,演出了一幕升天的闹剧。因此,在执行“官制象天”的古训上,不仅不打折扣,而且富有“创造”精神。他钦定改制,创造了一些官名。如下令取消“太史令”,改以古天文官“羲和”的名字取而代之。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刘向就曾充任“羲和”一职。刘秀在恢复汉室江山后,为表现他忠实地效法天廷,曾直接任命邓禹、吴汉、贾复、冯异等开国元勋为“云台二十八宿”,以形成对中央王朝的拱极之势。则天武后,为自己取名为“曌”,死后谥“则天大圣皇后”、“天后”,以显示其效法于天,矢志不移。她自诩

^①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89页注文。

如日月行空，普照四海，是居于万象神宫中的“大圣”。她的大臣多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命名，以应六合，以顺天道。甚至连农民起义领袖占山为王，安排义军的座次也不能脱离“官制象天”的窠臼，如北宋梁山泊义军首领晁盖自命“晁天王”。梁山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序列是按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排列等。其对中国政治观念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历代把王宫建筑作为实现这一原型模式（理想信念）的重要表征。于是，“象天设都”成为中国亘古不变的建筑原则。在先民眼中，北极为天之枢纽、天之中心，天帝在这里设紫微宫垣而居，施政于天下。皇帝的京邑必须效法上天，筑宫城于地之中心——土中。天之中宫既称作“紫微垣”，人间的皇宫也要称为“紫微宫”、“紫禁城”。天有银河天汉，皇宫必设护城河，天有天门二星，宫城必设左右二阙等，可谓亦步亦趋。例如，秦王朝统一后，以咸阳为中心，建京邑、筑皇城，使之象征天之阁道；建阿房以象征天之离宫；分三十六郡以象征群星拱极。更具匠心的是，秦以十月为岁首，目的在于每到十月，天象恰恰与都城，乃至整个“天朝”的布局完全吻合，形成一个天地人间彼此同步的神奇世界，这正是古人“承天永命”理想的一种自我实现。

在民众生活中，这一原型模式的文化作用，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家”、“国”同构的重要文化特征。中国的家庭以父家长为核心，乃是循着国家的构架而来的——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二者同出于对天国那个理想秩序界的认同。家庭结构以血缘为纽带。维系这个“小天朝”的是以父家长为中心的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网络。一家之长与诸多子女、亲属的关系，结构上有如一个群星拱北极的格局，形式上则与以等级、伦常为纽带维系君臣关系的国家结构如出一辙。

因此，有人说，中国文化几千年一贯地突出向心求衡的精神；有人说，从周秦、汉唐到近代，中华古国几乎一成不变地重复着中央辐射型体制，具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还有人说，在中国，冥冥中似有一种神

奇的力量制约着人的行为，模式千年不变，因而社会本位的传统观念一直没有失去统治地位，个性意识始终没有像整体意识那样深入人心……

的确，生活中我们也常有同感。无论是站在气势磅礴的秦始皇兵马俑方阵前，还是伫立巍峨的明清故宫脚下，或是痛定思痛，反思十年“文革”逝去的历史，你总能够或具体或抽象，或直接或朦胧地感觉到，在这幅员辽阔的广袤空间，在那上下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时间里，这古老的土地上，始终游荡着一个神秘的精灵。由于它的存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周而复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导演着一幕幕具有惊人相似性的历史活剧。

古老的中国文化，真像一个不可思议的魔术师。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在他手里井然有序地排列组合在一起，拥戴着一个至高无上的顶峰，开拓出一个个辉映千古的开明盛世，创造出以“天人合一”为独到特色的东方文明。那一亘古而来的北极天穹模式，邈远深邃的天国信仰，其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大，令人瞠目。

是什么因素最初导致中国人产生这般如此的观念形态？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神奇的原型模式形成？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原型代代相因、承传不绝？答案恐怕不能不到中国人独有的主观感受方式和能力、文化心理结构、民族经历等方面去寻找。前二者是其主观因素，后者是其客观因素。当然，文化模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它经历了漫长的血与火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命题。它将可能涉及许多史前文化、政治的论述，其中包括所谓中国人自鸿濛初辟以来渐次抽象形成的天文模式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是一种对最高的道德和理想秩序的追求、体认与模仿，一种属于实践理性范畴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然而过去注视甚少的一个方面。

以史为镜鉴，可以知兴替。让我们去叩响历史老人的大门吧，在历史长河的徜徉、回溯与寻觅中，我们将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有更多新的认识。

二 值得细细讲述的故事：“原型”简说

一段开场的话语，谈了不少“原型”之类的理论。那么，什么叫“原型”，什么叫“原型理论”？这似乎是一个应该首先予以回答的问题。

“原型”一词是舶来品，英文写作 archetype。该词源自希腊文 archetpos。“arche”本义是“最初的”、“原始的”；“typos”意为形式。它通常是指：一个原始的形象或者模式在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想中一再浮现，由此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或境界。

这个名词引自心理学家 C. 荣格的著作。基于这一概念的理解，荣格演绎出一套“共同的无意识原理”，又称“集体无意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各式各样经验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遗传密码传递给后代。十分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古时代就存在的宇宙形象”^①，用荣格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所谓的“宇宙形象”就是“上帝形象”或诸神形象^②。

加拿大学者弗莱是研究原型理论的重要学者，他不满足当时现成的理论，不迷信权威。于是他把荣格的意义加以引申与发挥：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它在文化实践中不断重复或反复运动，最终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形成普遍的原型或在文化承传中循环演进的程式^③。这一理论准确地概括了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现象。

弗莱推动了原型理论的普及。他曾形象地引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两句诗来概括这一理论的特征：

① 《集体无意识和原型》，《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1 页。

② 同上。

③ 参阅傅修延等：《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三章第二节《原型批评》，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6 页。

有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
真真值得仔仔细细地讲述

用这两句诗歌概括原型理论，确实有点简单化了，但人们却公认它描述准确、形象、易于理解。由上述情况可知，这个“故事”——原始模型的生成，表现为一种传统的在人们“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这种存在是自原始时代即已形成，并且顽强繁衍下去的文化现象。作为原始族团认识能力的产物，原型在人的心理上一旦形成明确的形式存在，即像是获得一种真理，很不容易放弃，即使受制于恶劣的社会环境，即使社会文明程度有了飞跃发展，它也会不断用自身的被人称作“置换变形”的形式，适应环境，顽强生存。以致最终通过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在民族文化中代代承传，“到处寻求表现”^①。研究并揭示这一规律的理论，叫做原型理论；运用这一规律进行文学批评或文化研究的方法，叫做原型批评方法。

原型理论对于文化发展某些规律的描述基本上是中肯的，因而被普遍用来揭示文学及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魏伯·司各特称之为学术研究的五大模式之一。魏尔弗雷德·居因等人把它列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四大方法之一。

尽管如此，原型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称谓。最初有人称它“神话批评”，泛指那种从早期宗教现象（包括仪式、神话、图腾崇拜等）入手探索和解释文学现象，特别是文学起源和发展的批评、研究方向。后来，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系统地阐发了神话批评学派的理论，正式确立了以原型概念为核心的“原型批评”学说。这种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一些神话学者又称其为“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之所以这样称呼，据说是因“神话批评和原型批评”是

① 参阅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引言”部分。

“两个并行不悖的同义”概念^①。

在原型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分别受益于三个不同的学科。它们是,以英国学者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瑞士学者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和以德国学者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正因为其内涵如此丰富,包容了许多现代科学流派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化学理论。同样,如果我们将对它做一个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型批评也决不仅仅是只适用于文学领域的理论,而是多学科学术研究十分便利的理论武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突出的“天人合一”文化特色。其演进进程轨迹清楚,大体符合原型理论揭示的规律。根据古人的解释,“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取决于人祖伏羲氏以来所形成的“仰观俯察”(详见第三章第一节)的思维方式。这种独具民族风格的观照方式,决定了华夏文化必定蕴含大量的自然比附和许多早熟的古代天文科学的文化因子;而道德与理性的追求,又决定了天国信仰模式的建构、承传,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巨大政治与教化作用。尽管天国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话思维的基础上,但这种思维的产物——神话,却如同原型批评理论认识的那样,是“哲学、宗教和艺术浑然未分时人类唯一的意识形态”^②。唯此,原始天文与神话从上古开始,作为人文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后世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而形成世风民俗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制约因素和外在表征因素。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原型理论尽管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学理论,却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发掘、整理华夏传统文化,梳理其渊源流变的重要武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两三千年前即已参悟出来的真理。

① 参阅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引言”部分。

② 张隆溪:《诸神的复活——神话与原型批评》,载《读书》1983年第6期。

三 箕路蓝缕以启山林：文化精神寻根

根据辩证的观点，事物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人们可以知道事物物质变的某种界限，但却很难在相关的事物之间做出绝对的、截然分明的划分。“文化”与“文明”就是这样两个概念。尽管如此，为便于对中国文化原型的分析与阐述，必须首先对它们做出界定。

据说，专家们曾对“文化”下过数百种定义，见仁见智，各不相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广义的“文化”概念与狭义的“文化”概念两类。

一般说来，广义的“文化”概念是和“自然”相对而言的。文化指人类实践的方式和产物，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和“文化”相对应的“自然”概念，不仅指人以外的自然界，而且指人本身的自然属性。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使自己获得了区别于自然并超越自然的内在本质。文化研究不仅要考察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要考察文化与人的自然属性的关系。由此看来，广义的文化囊括了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在人类出现之前，只有自然界存在，无所谓文化。作为万物灵长，人类出现后，自然界便以其是否受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而分为两大部分，而文化即是自然界中的人为部分。例如，一块天然的石头并不属于文化的范畴，但经过打制后即成为称作石器的人类的劳动工具，成为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作为自然物，天然石洞本不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但经过人类的居住、加工便成为远古文化研究的宝库等。

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以语言、文字为主要传播手段的精神生产活动。有些社会现象，如习俗、心理、宗教、艺术等，虽然未必完全靠语言、文字来传播，但它们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因此，也应包含在狭义的“文化”范围之内。看来，文化在实质上是通过各种物质形态所表现

出来的人类的精神，所以广义的文化往往包含人类精神对象化的物质产品以及精神产品两类；狭义的文化则是以精神产品为主的文化。

近代欧洲的许多学者对于文明与文化常混用不分，他们多以文明指代西方社会的文化。有些学者将文化看成是人类精神和价值的产物，将文明看成是人类物质和技术的产物。将文明与文化机械地加以区分，以及将其混用不分，都不可取。相比之下，倒是古代文明的概念颇有可取之处。

《易·大有》彖传中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此处所谓的人，具有刚健、文明的品德，又能总结规律、明察天道，并能适应这些规律。达到如此高度的人类，当然已不处于文化的初始阶段。《易·乾》文中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处“文明”与前例相像，都含有文采光明、文德辉耀的意义。要达到文明，必须“应乎天而时行”，也就是必须有掌握和适应自然规律的能力。可见，在中国典籍中所述的，“文明”是指人对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能力，以及人的品德已经达到了较高一级的境界。从社会发展水准而言，“天下文明”也已经是文化上升、社会进步的情景。由此看来，文明应当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文明与文化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人类文化演进到高级阶段才产生的。

一位导师说过：“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①该观点，集中为一句话便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②。这种认识学术界基本上趋于一致，如人类学家列·谢·瓦西里耶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曾经阐述过 G. 柴尔德关于文明的几个基本标准。其标准如下：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0 页、172 页。

② 同上。

城市类型的大型定居地；宏伟的公共建筑；有税收制度或定期的征贡制度以及资金的集中积蓄；经济包括商品交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专门的工匠已分离出来；文字；科学的萌芽（算术、几何学、天文学）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发达的艺术；特权阶级的存在；国家。^①

这是一组被许多专家无保留地接受下来的衡量标准。即使另行提出自己观点的人，在许多地方与柴尔德的标准亦殊途同归，具有共同之处。看来，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文明”一词意味着一个人类较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体阶段，而不是最原始阶段。本书赞同并选取这种“文明”概念的阐释。

根据这一观点，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②。

根据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具备了初步的国家形态，人们已经知道使用青铜器，并且也已产生了最初的文字体系，此时的中华古国确已迈进了辉煌的“文明”的时代。据此，进入 21 世纪，国家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二里头确定为夏文化的文化遗址。

另一种说法，则将中国文明史上推近千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考察良渚文化遗址后达成共识：中国文明的开始或形成是在近 5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因为这时期已出现有总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土台。这人造的远古工程，被称为中国的“土金字塔”，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良渚大墓的墓主人拥有大量象征神权、军权和财富的精美绝伦的玉璧和玉琮；墓葬中的殉人葬，使人

^① 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郝镇华译，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

^② 参阅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载《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感到明显的社会等级制的出现；黑陶器皿上成组符号的出现，则已然被学术界认为是原始文字的雏形^①。

关于中国文明起始的时代虽说法不一，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初步发达的文明究竟靠了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而形成，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轨迹而发展的呢？这一问题在今天难以计数的考古学成果面前，似已不难回答。关于石器时代的历史线索，已经为 7000 多个新、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大批出土文物所证实。史前考古学、史前史学科的建设正在完善中。以考古实物为依据写出的文化溯源著作时有目睹。读之每每使人感到兴奋，但仔细玩味，心中又不免产生种种缺憾：以原始遗址、原始文物为主要线索复原远古社会的客观形态，在历史研究中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然而，从另一方面——人的主观的方面讲，那些原始文物，实质上又是通过各种物质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精神。习惯于各种石器、陶器、青铜器的描述，依照碳 14 测定的数据确定古文化的绝对年代固然科学和重要，而流贯于器物形式、各色图纹、符号及典籍中的人类精神，同时也应被视为古文化研究的活的灵魂。抽掉或削弱精神内容的研究，难免造成缺憾。因此，本书拟在参照史前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以文化原型这种精神现象的发展脉络为主要对象，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现象进行文化学阐释的尝试，进行一番文化精神的巡礼与寻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过，如果你知道中国历史的昨天，你就会知道她的今天；如果你知道她的今天，自然就可以推知她的明天。难道这位身居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人的老朋友，仅仅是因为巧合而言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吗？

① 参阅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天国世界

| | |
|-------------------|---|
| ——一个神秘的文化原型 | 1 |
| 第一节 天的文化含义 | 1 |
| 第二节 天国的框架 | 9 |

第二章 天与人

| | |
|---------------------|----|
| ——天人关系流变 | 19 |
| 第一节 天命隐显与沧桑之变 | 19 |
| 第二节 “帝”的历程 | 25 |
| 第三节 “天”的再造 | 32 |
| 第四节 历史的凝结 | 41 |

第三章 法天而治

| | |
|-------------------|----|
| ——传统政治的文化特色 | 46 |
| 第一节 万变不离其宗 | 46 |
| 第二节 天生血缘 | 56 |

| | |
|-----------------------|-----|
| 第三节 人格与道德 | 66 |
| 第四章 时空宇宙 | |
| ——天道与哲学 | 71 |
| 第一节 阴阳五行臆说 | 71 |
| 第二节 “河图”、“洛书”探源 | 94 |
| 第三节 八卦与天体宇宙模式 | 103 |
| 第四节 天体论争的文化含义 | 110 |
| 第五章 象天设都 | |
| ——天文观念与中国建筑 | 117 |
| 第一节 传统的形成 | 117 |
| 第二节 形式的嬗变 | 122 |
| 第三节 故宫的建筑观念透析 | 129 |
| 第六章 负阴抱阳 | |
| ——中国传统环境理论 | 139 |
| 第一节 风水流派与代表人物 | 139 |
| 第二节 形势宗的基本理论 | 147 |
| 第三节 理气宗的基本理论 | 160 |
| 第七章 知天必胜 | |
| ——军机与星占 | 180 |
| 第一节 由“初恋”到“结缘” | 180 |
| 第二节 知天与神机妙算 | 190 |
| 第八章 则天观念的活化石 | |
| ——天体崇拜与民俗 | 197 |
| 第一节 天体崇拜与祭祀风俗 | 197 |